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开放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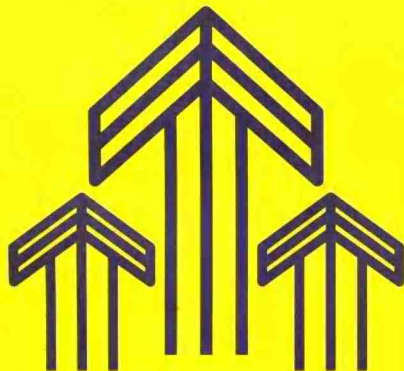
中的非均衡 宏观经济学

著者/[美] 约翰·柯廷顿

[瑞典] 佩-奥洛夫·约翰逊

[瑞典] 卡尔-古斯塔夫·劳夫格伦

译者/林 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F18/O1

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 宏观经济学

著者 / [美] 约翰·柯廷顿

[瑞典] 佩-奥洛夫·约翰逊

[瑞典] 卡尔-古斯塔夫·劳夫格伦

译者 / 林 谦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T. Cuddington, Per-Olov Johansson

Karl-Gustaf L fgr n

**Disequilibrium Macroeconomics
 In Open Economies**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4

根据英国巴登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1996-077 号

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

(美) 约翰·柯廷顿等 著

林 谦 译

宋承先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625 插页 2 字数 20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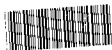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327-2030-6/F·093

定 价：13.90 元

译者的话



071016

Feb 14
071016

作为译者，值本书付梓之际，理当就本书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作一番客观、公允的评论。由于无意将译序写成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现仅就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断想作一简短陈述。

众所周知，本世纪70年代初期，蔓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停滞膨胀”，一方面赋予了西方经济危机以前所未有的现实特征，另一方面又为主宰西方经济理论讲坛数十年的凯恩斯学说设下了难以摆脱的怪圈。昔日的“万应灵药”，于今已变得“医首则足疾，治腿则头晕”。面临这种困境，西方经济学界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各种思潮、流派蜂拥而起，一心要填补理论“真空”。作为战后受凯恩斯理论熏陶而成长的新一代经济学家，聚集在不同的旗帜下，展开了新一轮的抗争。其中风头尤健者当数“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以卢卡斯、萨金特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新古典的“理性人”、“自然率”学说为根据，以“理性预期”概念为锋芒直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学说，着力证明政府“相机抉择性”干预政策的失灵，从而使得长期

冷落的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以克洛尔、莱琼霍夫德等为先导的“新凯恩斯主义”派,着力于从《通论》的字里行间去把握、诠释凯恩斯本人的逻辑思路,努力在资本、劳动、商品三大市场的“总体失衡”状态以及由此派生的部门失衡中探索、构筑更为庞大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而把凯恩斯本人所提出的“非自愿失业”仅仅列为其中的一个“特殊情形”。如此一来,对于政府干预政策的研究已逐渐由过去的总量化转向结构化。目前看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这一点,已为双方所共识;而如何填平宏观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的“鸿沟”,也是各自努力的方向;“理性预期”也罢,“相机抉择”也罢,任何一方都不可推之极端。其原因在于:过犹不及。美国经济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话语或许可以预示着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未来方向:“假如我们看到一种知识结构在分化解体,发现它的碎片形成了相互对抗的学派,那末,最终会带来的东西——如果我们钻研一下任何科学的历史——将是一种综合了更多内容的新的结构。”^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就是反映了西方经济

^① 引自《经济理论的危机》([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编,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页。

理论的现状与未来的某种走向的“新的综合”的一个结果。从学派“综合”角度来看,如同本书作者所声称的,其理论框架虽应列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名下,然而其研究方法又渗透着极其浓厚的、以研究小国开放经济问题而著名的“北欧学派”的理论色彩;从学科“综合”意义上来看,本书把封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理论成果与国际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极力打破传统的微观、宏观、国际三大部分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为在比较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开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探索。

以这两种“综合”为其方法论特征的本书具有如下一些理论特色:(1)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总结了现有的关于封闭式非均衡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著述作了简短、清晰的比较式评述,这使得读者可以把握非均衡理论孕育、兴起和发展的脉络。(2)通过运用跨时期的理论视角,阐述了价格在永久性变动与暂时性变动上存在的差异及其效应;通过运用所谓的“双重节奏”研究方法,比较了价格调整和数量调整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效应,从而为摆脱“一般均衡理论”或凯恩斯理论未曾顾及或深究的时间因素、不确定因素和预期因素所引起的弊端作出了尝试,也为同“理性预期”学派在未来可

能发生的“合流”埋下了伏笔。(3)它一反过去公认的凯恩斯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所具备的)相对轻视货币所具作用的传统。借助于区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思维方式,强调了开放经济中货币在厂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中引出有关各种宏观非均衡状态形成和消失条件的论述。(4)它还考虑到了资本在国际间能够进行充分流动的情形。以这一点和第(3)点为条件,作者对处在固定汇率、浮动汇率体制下的小国、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包括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关税、配额)进行比较。(5)在努力接近国际经济现实的两个两部门(贸易性-非贸易性、出口性-进口性)开放经济模型中,作者为各个方向上的非市场出清状态构筑了模型,并且对处在不同状态中的国内经济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所具有的国民收入、部门就业和产出、国际收支等方面的效应进行了比较。(6)与传统的忽略福利问题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同,本书对于存在要素闲置(如劳动失业、资本闲置等)状态的开放经济也可运用的成本-效益法则(即开放经济体中的项目评估法则)进行了专门的论述。(7)作为一本着眼于大学生、研究

生使用的理论读物,本书的数学程度基本上处于中级水平(除了两个附录的数理分析稍许艰深一些外),这就使得对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主要是导数、矩阵)略有所知的读者即可读懂之。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成功的作者不仅在于其著作中能解决多少问题,而且在于能够引出多少问题。同样,一个成功的读者不仅在于从其所读中能够明白多少问题,而且在于能够发现多少问题。毋庸讳言,作者在社会环境、指导哲学、价值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差异甚大。既不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摒弃,也不把“孩子”同“脏水”一起保留,这是我们对一切外来东西所应持有的基本立场。我们把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研究、评价和利用本书的工作留交读者。相信有志于探寻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国情的开放经济理论的各位同仁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使其为我所用。

译者不敢以“信、达、雅”三字自诩,只求能把原书的要旨明白无误地传达给读者。不当之处,还请指正!这里需说明的是,对于“General Equilibrium”一词,国内一般译作“一般均衡”。译者认为,对于本书大量出现的General Disequilibrium译作“一般非均

衡”不如“总体非均衡”更加符合汉语习惯，故译者取了后一种译法。与此相对应，“General Equilibrium”译作“总体均衡”。此外“Trade Balance”一词，在译文中有时译成“贸易收支”，有时译作“贸易差额（前者反映的是进出口间的一种对比，后者则指两者相抵后的净值），它们的取舍依行文而定。

最后，译者感谢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尊敬的老师宋承先教授对于译稿的指导与校正。无疑，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灿烂前景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所抱的热切期望，是促使我们共同努力把《开放经济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一书的中文译本奉献给各位读者的基本出发点。

林 谦

1990年5月于上海虹桥



导言

1.1 研究的学术根源

回顾起来,70年代无疑将会被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变革时期。在这期间,政策制订者们遇到了许多往往是国际性的新情况:持久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协议的崩溃、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卡特尔的崛起和1973年的石油禁运、1973—1974年的原料价格冲击、急剧增长的国际债务以及1981—1982年创记录的高利率。

针对这一背景并在某些场合作为对它的反应,宏观经济理论本身也跨入了一个自我反省和进行批判性的再估价的时期。理论研究在两个方面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由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及其他人倡导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预期学派,在阐释一种有别于正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观念的范例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作为基本的研究前提,这一学派假设:(1)对各种关键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是理性的,意指它们按(统计上的)最优方式包含了所有现在可以获得的、关于经济结构和过

去经济行为的信息,以及(2)所有价格具有完全的灵活性,通过连续的调整而使各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相等。这种模型的目标在于,提出经济周期的“均衡”理论,并在这种关系中确定总需求管理政策以及“供给方面”政策的功效界限。

研究的第二个方面,不是要放弃现有的宏观经济范例,而是试图整修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结构并使之普遍化。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这方面的文献皆假设众多的价格和工资在短期内呈现粘性。事实上,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在其重要著作《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的经济学》(1968)中,就已指出,凯恩斯《通论》(Keynes, 1936)的重要启示就在于:数量调整的发生要比价格调整快得多,而“非均衡”状态的市场是正常的经济状态。持续的交易是通过数量调整形成的,在一个市场中(例如劳动市场)察觉到的数量约束也会影响到其他市场(例如各种商品市场)的供给或需求。因而,市场条件变化的最初冲击首先可以在定货单、交货期、存货、失业队伍和工作时间等方面感觉到,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只是随时间的推移才逐渐出现。

正如最近对具有数量约束或“配给”的暂时均衡模型的微观理论研究所表明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最适宜被看作是特殊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而不是看作“非均衡”模型和趋向均衡的动态调整模型^①。在希克斯(Hicks, 1965)看来,它们属于固定价格模型。也就是说,即使价格发生变化,其原因也应到模型之外去寻找。刚性价格假设的另一种理由是,相对于实际的和察觉到的数量约束的变化速度,出现价格调整的速度将非常

① 参见格朗蒙特(Grandmont, 1977a)对暂时均衡模型的研究。

迟缓。因而，后者在与短期分析相关的时间结构中可忽略不计。

固定价格、数量约束的模型——它们也常被简称为“非均衡”模型——的学术根源相对说来较为悠久和分散。有关厂商在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即它们不可能按现行价格购入和售出无限数量时将如何行事的最初的明确论述，可以在唐·帕廷金(Don Patinkin, 1956)的创新性著作《货币、利息与价格》中找到。根据詹姆斯·托宾和亨德里克·豪撒克(James Tobin & Hendrick Houthakker, 1950—1951)早期的有关微观理论的研究，罗伯特·克洛尔(Robert Clower, 1965)在他的开拓性论文中论述了家庭所面临的相应决策问题。克洛尔所考虑的情形是，家庭面临的(外生性)价格向量使他们察觉到具有约束力的就业限制。也就是说，在给定的现行工资和商品价格水平下，他们无法找到对他们愿意提供的所有劳动量有需求的需求者。因此，他们对商品的有效需求与名义需求有所不同，问题在于，前者反映了察觉到的就业约束和通常的预算约束。

把受到数量约束的厂商、家庭的行为结合到总体非均衡模型中，这一并非微不足道的问题，是由巴罗和格罗斯曼(Barro and Grossman, 1971)的论著予以解决的。从此，这个基本框架为各种被称作宏观经济“非均衡”理论或具有数量配给的固定价格均衡理论的一系列学术文献提供了基础^①。这个由巴罗和格罗斯曼率先提出并由其他人进一步阐发的模型，考虑的还只是封闭经济问题。近年来，已经进行了将这个

^① 这些文献包括巴罗和格罗斯曼(1976)，马林沃德(Malinvaud, 1977, 1980)的著作。见本书第2章和德雷曾(Drazen, 1980)有关文献的评述。

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中去的诸多尝试^①。

1.2 研究的范围

本书的目的在于对有关开放经济中固定价格均衡的研究进行全面合理的综合。鉴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要求任何定形的研究都嫌为时过早。事实上,在几个重要场合中,我们都已试图弥补有关文献中存在的主要差异,以便更系统地论述处于开放经济的固定价格均衡关系中的各种经济政策。

把对封闭经济的研究推广到开放经济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各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对外部门,因而把对外部门包括其中会使模型更加符合实际。本文提出的另一个或许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们相信,作为对现有的被典型地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瓦尔拉均衡模型的补充,发展开放经济的“非均衡”模型是十分重要的。“非均衡”模型在这一方向上的推广为研究经济政策的运转提供了许多新颖见解,并且很有希望为把纯粹贸易、贸易政策和国际宏观经济学综合在同一理论结构之中铺平道路。

1.3 本书的计划

第2章对固定价格理论的起源作了全面的评论,概述了各位研究者的创造性贡献。该章讨论了价格为何是固定的

^① 参见迪克希特(Dixit, 1978),柯廷顿(Cuddington, 1980, 1981);尼里(Neary, 1980),约翰逊和劳夫格仑(Johansson and Löfgren, 1980),和斯泰根(Steigum, 1980)的著作。

或调整只能是很缓慢的这一理论问题,但也承认这个问题在文献中仍然悬而未解。

第2章中的各种固定价格模型都属于封闭经济模型。在第3章,我们引入了开放经济的单部门固定价格模型,它类似于迪克希特(1978)模型,但更强调家庭决策问题的跨时期性质,如同米尔鲍尔和波特斯(Muellbauer & Portes, 1978)在封闭经济情况下所作的研究。该模型在一定范围内也被用来分析经济政策效应,例如,对影响汇率下降效果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然而,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最简单、最明确的形式向读者介绍开放经济的固定价格模型,以便于理解随后一些更为复杂的模型。在以后的一些模型中,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强调宏观经济的非均衡理论对于研究开放经济中的各种经济政策是很有用的。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也在于这一点。

第4章展示了一种两部门的固定价格结构,用来分析开放经济中的各种稳定性政策。这个特定模型,区分了贸易性商品和非贸易性商品,可用于分析在不同的非均衡状态下实行财政政策和实际工资调整(通过工资—价格政策或贬值)的各种效应。本章始终保持了固定汇率的假设。

将浮动汇率恰当地引入固定价格背景的问题之一,在于将多种资产持有结合进微观理论结构之中,就象准确地掌握能产生资产需求的跨时期决策过程以及货币的促进交易的作用那样。早先的对浮动汇率情况进行分析的各种尝试多数是不够充分的。它们假设货币为唯一资产,并且硬性添加上汇率调整可持续出清外汇市场的条件。在不存在非货币资产的情况下,这等于是假设贸易差额(也就是本国收入减去支出)在各个以及一切时期中,皆等于零。与蕴含在固定汇率情形中的

跨时期预算约束相比较,这种逐个时期的约束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因而,早先有关固定和浮动汇率情形的比较研究,一直受到不相称的跨时期预算约束分析的损害。

第5章在存在完全资本流动的金融市场机制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论述过程中,该章阐发了一个处在凯恩斯式失业状态下的模型,它与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 M—F)模型密切相关。然而,在明确阐释在两部经济中实行数量配给的各种效应这方面,它又超越了M—F模型。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对照研究了处在浮动和固定汇率下的各种稳定性政策,例如财政、货币和工资等政策。或许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存在浮动汇率制的古典式失业情形中,证明了由债券资助的政府支出的增加是收缩性的,这是由随后的汇率升值对贸易性商品部门造成的逆效应引起的。

第6章回到固定汇率制的问题上来。通过区分出口性和进口性商品而不是贸易性和非贸易性商品,并且考虑到厂商和家庭或许会察觉到国际贸易商品市场上存在数量约束的可能性,第4章的模型在这里得到了修正。在第4章中,配给发生于非贸易性商品市场而不是贸易性商品市场。运用出口性—进口性结构,第6章分析了各种贸易政策,例如进口数量限制以及存在非均衡价格和工资时的政策变化。

通过探讨在固定汇率下进口关税对各部门就业、产量和贸易收支的影响,第7章继续论述贸易政策。运用第5章的完全资本流动模型,本章的后半部分对浮动汇率下关税的各种效应作了讨论。

有关经济政策功效的讨论,多半是根据它对各种变量,譬如就业、产量、价格水平和对外平衡的影响而展开的。根据这

些影响,我们希望能进一步推测有关国民福利的某些内容,而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对国民福利进行定义和作出估计是困难的。然而,目前的这个固定价格结构是建立在坚实的、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上的,这就便于依据微观经济学原理作出更严密的福利分析。为说明这一点,第8章推导出当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存在配给时也可以运用的成本-效益法则。我们将证明,非均衡的影子定价法则具有状态敏感性;而从局部均衡分析中导出的法则,在大多数成本-效益手册中可以寻及,在非均衡条件下却很容易导致谬误。鉴于本章把有关成本-效益的著述推广到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开放经济中,它肯定能引起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学生们的兴趣。

本书正文以提出未来研究途径的第9章结束。本书还包括了两个技术性附录:第一个论述配给的微观经济学,第二个论述短期数量调整和长期价格调整。

1.4 本书与多恩布什著作的比较

至此,将本书内容同标准的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作一番简短比较,也许能说明许多问题。为了这一目的,我们不惜以视野可能会过于狭窄为代价,将注意力集中于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 1980)的专著《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上。

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常用的方式相比,我们的著作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用来分析经济的生产方面。我们详尽分析了价格和工资不一定会立即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的两部门机制。运用完善的微观理论结构,我们论述了将会出现的各种

非均衡情形——包括把通常的凯恩斯式失业视为其中的一种。与标准的开放经济模型所能做的相比,例如多恩布什(1980)的模型,本书更为详尽地分析了货币和财政政策对于就业、总产量、部门产量以及贸易收支的作用。那些模型都忽视了各种非瓦尔拉均衡情况中的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在特定含义上存在的重大差异。

与我们的研究方法相比,多恩布什模型(它通常假设存在充分就业)更详细地论述了财政和货币因素、调整动态学以及汇率预期等问题。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在有关固定价格的文献中所获得的研究还十分贫乏。

本书在宏观理论结构中对各种贸易政策,包括关税和配额,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它考虑到贸易失衡和失业,因而得以避免纯粹贸易模型在贸易问题的分析方法上存在的主要缺陷。我们的结构还能够对进口替代政策进行深入的宏观经济分析,然而它又能符合处在粘性价格和配给约束下的微观经济学。

最后,通过阐释在总体非均衡模型中如何处理成本-效益分析和其他福利问题,我们超越了宏观经济学的通常范围。尽管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以研究生水平的纯粹贸易理论进行分析,但也大量运用了瓦尔拉的市场出清机制。在考虑工资粘性的情形中,仅仅分析了古典式失业情形。我们的结构还允许把本书推广到凯恩斯式失业的情形,从而在经常运用于现代福利分析和纯粹贸易理论的传统宏观经济模型与微观理论模型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